

美国国务院  
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

---

2015年4月27日

专题小组讨论会  
权利现状：中国的新闻自由与媒体准入

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夫斯基  
及何孟德、陈嘉韵、凯瑟琳·麦克劳林、温信殷

2015年4月27日  
美国国务院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何孟德先生：**都准备好了吗？大家早上好，欢迎参加今天的“权利现状”活动。在5月3日的“世界新闻自由日”来临之际，今天专题讨论的题目是中国的新闻自由。我叫何孟德，是国务院中国和蒙古事务科科长。我谨向所有参加者，无论是亲临现场还是网上连线参加的，表示感谢，并要特别感谢从美国各地远道而来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各位主讲人。

我要说明一下，我们原本期待大西洋月刊的詹姆斯·法洛斯今天会来，但不巧的是他被选中履行陪审团义务，所以另一个公民责任使他今天无法前来。不过，我们感谢今天到会的另外三位主讲人。

今天的专题小组讨论会将采取互动形式，我们将收集现场和网上听众提出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在推特上接推的团队，所以推特空间的人们可以随时提出问题，发推提问时请加井号标签：[#StateofRights](#)。是[#StateofRights](#)。

今天的活动还在网上播出，网址是：[humanrights.gov/stateofrights](http://humanrights.gov/stateofrights)。即[humanrights.gov/stateofrights](http://humanrights.gov/stateofrights)。

下面言归正传，我请今天专题讨论的主持人，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林诺夫斯基做开场白。马林诺夫斯基助卿，请您讲话。

**马林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非常感谢你，也感谢今天和我们一起参加这个重要活动的各位。我们今天，实际上是这个星期，在国务院举行促进新闻自由的活动。每次——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举行这个活动。我们反思并重申我们为促进全世界新闻自由做出的承诺。我们向因从事新闻报道而失去生命或被监禁的新闻工作者所作出的牺牲表达敬意，并敦促所有国家的政府尊重网上与网下的新闻自由这一普世人权。

各位已经听说，今天早些时候，国务院将启动第四年度的“让媒体获得自由”活动。这对我们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尽管其重要性显然仍不足以成为可以不履行陪审团义务的理由。（笑声。）我们在这个活动中介绍身处险境的记者或媒体机构，他们由于报道真相而遭到新闻审查、攻击、威胁、被失踪或被控犯有重罪等各种形式的打压。本周的每一天国务院发言人都会提及两三个有关遭到威胁的记者或媒体机构的案例。例如，今天我们将介绍最近被定罪的中国资深媒体人高瑜。最近这位备受尊重的资深记者在收到不公开的审判以后被以向外国媒体机构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判处7年监禁。我们会把高瑜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情况上网，网址是：[www.humanrights.gov](http://www.humanrights.gov)，我们将把这些案例在推特上发送，标签为：@FreeThePress。我鼓励所有人在各自的圈子里与他人分享他们的故事，包括转推、发博文、发帖，或者假如你非如此不可，可以使用旧式的交流方法，直接向你的家人和朋友讲述。

开展这项活动的目标很简单：为那些不能为自己发声的记者呐喊；敦促所有国家的政府保护言论自由；强调我们在全世界促进实现这些目标的决心。

今年1月，就在这栋楼里举行的新闻工作者安全公开论坛上，克里国务卿说：“无论是铅笔、钢笔、照相机，还是麦克风所象征的新闻自由正在受到有意识的打压。这是因为，一些人、一些组织、甚至一些政府想控制真相，想左右真相，想隐瞒我们所知道的真相。很明显，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尤其是在令人震惊的1月7日的巴黎事件发生之后。”

接下来，我们谈中国。我无需告诉各位，在中国做新闻报道是一件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需要做好，但这又是个极为困难的工作。那里的记者，外国记者，尤其是当地记者，目前受到了种种限制，使得他们更难完成他们所从事的重要工作。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希望并需要相互了解。我们在对方的国家学习和经商。我们之间有深厚的民间联系。因此，新闻是我们与中国关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们两国一同面临挑战和机遇之际，有关对方国家的直率而坦诚的媒体报道对帮助我们相互了解至关重要。

我在这里要说，美国向中国记者完全自由开放。中国官员可以完全自由地把信息传递给美国人民。如果你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假如美中之间发生一个严重危机，就会出现严重失衡，因为美国人民可以完全了解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观点，而在当前各种限制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却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来了解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所表达的看法。

这一切正在发生着，但与此同时，还有促使情况朝相反方向发展的一些趋势。由于社交媒体以及政府难以控制的其它交流方式的使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如今已经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更大能力。或许这可以解释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政府做出的强力反推。

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数字平台使得人民有能力形成和分享自己的故事，而这正是我们要加以鼓励的。著名的美国记者爱德华·默罗曾经说过：“国际交流中真正关键的环节是最后3英尺，连接这个环节的是人际接触，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的交谈。”如今，互联网成为我们比过去更容易消除这种隔离的桥梁。成百上千万的中国公民和美国公民有相互联系和加强相互了解的潜力。

作为政府官员，我认为这一点既重要又令人振奋，因为各种各样的对话可以同时展开。个人可以和政府对话，政府可以和个人对话，假如允许开展这样的交流，那么随着交流的展开，中国将成为一个更稳定、更具有活力和更繁荣的国家。美国在世界上也将更安全。

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将要讨论这些问题。在场的有一些比几乎所有人都更了解这些问题的杰出记者。我们有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温信殷。我们有曾经在中国为半岛电视台工作、现在是半岛电视台美国频道驻旧金山记者的陈嘉韻（梅丽莎）。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请到了曾在中国工作了 10 多年的记者凯瑟琳·麦克劳林。她报道过的内容从中国的劳工受虐到社会动荡，范围广泛。

好，我谨此感谢各位能参加今天的讨论，分享你们的远见卓识。我想现在应该请你们发言了。或许我先开始——我马上就会加入到你们中去。或许，我先问温信殷先生一个问题。我们——我想我们会用多一些时间来谈您在中国做外国常驻记者的经历以及您自己和您的一些同行曾经面临的困难。不过，我想我们应该先针对中国记者所面临的麻烦和磨难来谈，或许您能谈谈最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既包括为中国媒体工作的中国记者，也包括为外国常驻记者工作的中国记者。谢谢你。

**温先生：**喂？好，很好。谢谢——我想对安排我们参加讨论会表示感谢。我还想感谢国务院把这个问题定为讨论题目。从某些方面看中国正处于一个极为疯狂的年代，那里的人权状况——整体来讲，在所有的领域都面临打压，我认为是 10 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前所未见的。新闻自由是一个突出的领域。我认为，自从领导层换届以来，他们的作法是，在每一个领域都抓一些典型，恣意把他们投入监狱，他们有时会遭到殴打，家人受到威胁。新闻界也不例外。就中国记者来说，我想，保护记者委员会曾经说过，中国监禁记者的人数多于任何其它国家，入狱的都是中国记者，没有驻在那里的外国记者。

所以，我想把那里的现状概括一下，过去恶劣，现在更糟。对于中国记者来说，他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是经常会收到政府指令，每天告诉他们哪些消息可以报道，哪些不能报道。很多老一代的记者都离开了，他们不再做这一行是因为他们不能做当初入行时所希望做的工作，他们的家人受到威吓，他们的生计受到威胁。

有一些老一代媒体人坚持下来，他们做的工作非常有意思，例如有关现在正进行的反腐，对政府官员腐败的打击。大概一年到一年半以前，他们开始曝光政府官员大吃大喝的视频，导致很多相关官员被调查。很多，像他们开性派对时的性活动视频，相当有意思。不过，这些记者起初会受到政府赞扬，说：“啊，你们是反腐运动的一部分，”可是过不了几个星期他们就马上就被迫害。这个领域存在众多挑战。

在年轻一代的新闻记者当中，我三年以来和其中很多人交谈过，实在令人感到心碎，因为很多人，就像在美国一样，都怀着极大的热忱投身媒体，出于你们都会感到钦佩的理由。但是，他们一旦开始在体制内工作，就发现了限制。其中一个人对我们报社说，就好像带着脚镣跳舞。你跳不了舞——你能做的动作非常有限。另一个人形容说，就好比有一条没有明确标出来的线，当你知道自己越线了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中国记者经常做自我审查，揣测哪些政府会允许，哪些政府不会允许。他们总是想打擦边球，等他们意识到做过头的时候，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马林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也许你想——要不那样？哦，这样就行了。（笑声。）声音太大。不，我想不是你的。一直按住按钮。

**麦克劳林女士：**现在打开了吗？

**马林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好了。

**麦克劳林女士：**我想接着这个话题说，看看能不能把在中国的外国记者的状况从历史的角度给各位做一个概述，因为我本人也多少算是个历史了。我 2003 年第一次到中国做常驻记者。我 2003 年到那里的时候，规定是相当繁琐的。首先，我要说当时最麻烦的规定是，除非事先获得要去之处的许可，我们不能离开驻地到任何地方去采访。比如说，你如果想去山东报道一个地震事件，就要先取得山东官员的允许——你可以想象中国的官僚机构——这既不容易得到，而且经常不批准。在最初那几年，我想我只申请过一两次外出采访许可，从来没有获得批准。

2008 年奥运会之前，中国政府采取了重大步骤，取消了那项规定。抱歉，我的手由于神经损伤而发抖，所以我——（笑声。）无论如何，那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进步。我们可以去中国任何地方，无需事先批准，也没有重大限制，情况发生了重大改观。我记得，2008 年取消规定之后，我到中国的一些省去，被警察拦下来后就给他们看国务院的规定，说允许我们到那里。但是随后规定很快就又改变了——就是说，我们眼看着轨迹向上走向上走，然后很快就开始看到回落。

我要说，到 2010 年之前，事情开始变得更糟。那段时期，由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自愿组成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开始在会员中针对报道时遇到的问题进行调查统计。我会给你们一些最近一次，也就是 2014 年调查的数字。调查通常在 5 月份进行，所以下一次调查的结果还要一两个月才会出来。最近这次调查显示，在过去一年间有三分之二的外国驻中国记者在工作时受到过骚扰或干预。使用中国助手的外国记者中有一半人说，他们的助手受到了骚扰，比前一年增加了 35%。提供信息的中国人由于和外国媒体联系而受到骚扰的案例有 66 起。也许最值得注意和最令人担忧的是，有 18% 的外国记者在续延记者证和签证的时候遇到麻烦。这些人当中的一半说，这与他们的新闻报道有关。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你所写的或者你所报道的题材，如同梅利莎的经历那样，其实都会影响你是否能在中国作报道。我一直有这个怀疑，但是现在这个怀疑在一些事例上已经得到确认。我想，这就发展到了一个时期。在我们很多外国记者的头上一直笼罩着潜在的自我审查的乌云，其中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信息来源、保护我们的中国雇员，但是现在我们进入了这个时期，我们报道的主题或内容，以及我们如何进行报道，都会影响到我们是否还能进入这个国家从事报道。

因此，我说，这是一个新的、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还没有人想出来应该怎样应对。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听到了各种建议，包括采取通过签证互惠和别的措施，但是我觉得还没有人真正想出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方案。

顺便说一下我的亲身经历：我为获得环球邮报的记者证努力了三年。环球邮报是一家网上新闻机构。中国对网上媒体不发记者证，所以我始终没得到。只有一家纯网上新闻媒体现在得到了半职记者证。我想他们得到了6个月的签证。但是你可以想象，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人们都通过 BuzzFeed（注：美国的一个新闻聚合网站）看新闻。他们——抱歉，温信殷先生——不读新闻，基本不再读任何印刷刊物。而媒体中的这个部分整个被禁止在中国做合法报道。我们在所有这些不同领域都受到限制，情况并未朝好的方向发展，基本还是2008年之后的那种局面，但是很可能朝恶化的方向转变。

我想我们现在该让梅利莎发言了，她能告诉我们——

**马林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好，那么你接着往下讲？不过，我想一些人已经知道你的经历，但或许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要不你就从那儿开始？然后我想知道你对新闻自我审查的问题有什么想法。好吧。

**陈女士：**我想，其中一个——我今天能在这里的部分原因是我2012年被驱逐出中国。我想，我是十四、五年来第一个有这个经历的外国记者。当时，中国政府是这么做的——我已经在中国待了四年。通常这时候就要去申请延长签证。半岛电视台英文频道决定把我的离开称为驱逐。从技术上说，中国政府就是没给我延签证。之所以不寻常是，大多数记者到中国去常驻，满一年的时候延长签证再工作一年是意料中的事情。而我得到的是两个月签证。这实际是发出信号，要把我拴在很短的缰绳上加以控制，或者说至少把我和半岛电视台拴在很短的缰绳上加以控制。

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给我——关于他们为什么以这样方式对待我的说法后来又变了。起初，中国对一个我并没有参与的半岛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表示不满。我走了之后，变成了人身攻击——政府媒体写了几篇文章。事实上，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们连我的名字都不提。我就好像属于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伏地魔（注：小说《哈利波特》中的一个角色）那一类。我认为，在集权国家，人身攻击是对付新闻记者的一种常用手段。如果他们对你的道德提出质疑，那么就可以进而对所有你写的报道提出质疑。

我通过第三方渠道做了一些了解，因为我离开之后中国外交官员从来没有和我讲过话，但是他们对一些代表团和其他记者讲过；显然我是违反了某些法律，不过他们从来没有能确切说明究竟是哪些法律。

下面再回到给我两个月签证的时候。这发出一个明确信号。我认为，记者都不愿意谈自我审查的概念，会感到非常不舒服，因为我们都想认为，我们不做自我审查。但是在像中国那样的国家里，我和很多外国记者的多次谈话都涉及到了他们为是去做这个还是那个报道而仔细考量。当然，在那两个月期间，大部分时间我们照常工作，不过有些时候我会说：“嗯，现在关系不太好。或许我应该先等一等。”对此我没有感到骄傲的，但是我想大家都有过这种经历。

无论如何，两个月之后，我得到一个只有一个月的签证——控制的缰绳拉的更紧了。我很高兴我最后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因为我觉得向中国政府显示恐吓无济于事非常重要。在我最后的一个月里，我决定要写一些报道。坦率地说，要不是他们给我那样的压力，我很可

能不那么强烈地想写那些报道。我决定写一篇报道，再报道一下黑监狱，也就是中国的非法拘留中心。北京就有。中央政府经常把侵犯人权或其它虐行归咎于各省政府，但是如果事情发生在距离北京天安门广场车程 20 分钟的地方，我想就更难辩解说，政府——中央政府没有任何责任。

我还试图采访人权律师浦志强，那是我最后一个月。现在，浦志强已经被关押，但和我试图采访他无关。我想，这也说明了中国的人权状况。

我想，我最后想说——因为很多中国大陆的学生和其他人都问我，为什么我的报道如此批评中国。我只想说，我现在驻旧金山，我批评的是美国社会中发生的错事。我认为，基本上来上讲，记者就是这样的负能量人物。（笑声。）我们必须得这样，至少我们的职业必须如此。我在职场之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笑声。）

但是现在我在这里；国务院要我今天在这个专题讨论会上发言，我想特别指出一个事实：新闻自由就是这样——半岛电视台和今天播出的我的一篇报道批评国务院，披露也门裔美国人把国务院和约翰·克里国务卿告上法院的消息——也门裔美国人觉得他们在美国是二等公民，他们对一些对宪法赋予的权利感到十分担忧。这个报道今天播出，然而我现在就在国务院。我想，指出这个区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谢谢你们。

**马林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谢谢。谢谢梅利莎。嗯，那篇报道还没有播出，因此目前你还是自由的。（笑声。）但是我们将密切关注，你要小心。（笑声。）我们将——我想我们让听众提些问题。如果任何人想加入讨论，就想个问题出来。但是在你们想问题的时候，或许让我向你们所有人提个问题。

我是说，当你们从中国写有关中国的报道时，你们有没有——你们心里最先考虑的是什么受众？你们觉得是在为美国受众写报道，还是既为中国受众、也为美国受众写？你们是否想到更广泛的中国受众而不仅仅是那些据说监视你们写的每一个字的国安人员，会如何阅读、如何看待以及如何理解你们的报道？

**麦克劳林女士：**是的。我的意思是，我会说两者都想到。在中国写报道有一个危险，你最后往往变成为其他写有关中国文章的作者写东西。但是我想，你如果经常外出旅行，就会知道中国人民对外国媒体的注意。所以我想这里有一个双重责任，你既为美国受众写报道，同时也为那些他们自己的媒体受到严格限制的中国人民写报道。因为这两个受众相当不同，所以难以做到两全其美。因此，是的，要我说两者都有。我不知道。我是说，我想——我一直都以为我的主要受众是美国人，但是如果他们[中国人也关注]——我不会感到意外。大约一年前我为 BuzzFeed 写了一篇有关一位目前居住在纽约的中国异议人士的报道，之后这篇报道被疯传，成了大事。我想，到最后流量各占一半，来自中国的没准儿还更多，因为有关她的消息在中国遭到严格审查。

我想，这篇报道的受众两边基本相等，我觉得那是正常的。

**温先生：**有时候会发生怪异的事情，就是，中国媒体也会提及你的报道。你的——我主要想的是为美国人写报道，向美国介绍中国。但是，即使是有关人权的消息，有时候也会

出现怪异的情况，中国媒体由于不能报道某些题材，就会提我的报道，然后说：“这就是美国对认为是我们的问题的宣传。”但他们实际上却提到了这个问题。比如，我写了有关反腐以及调查人员如何对本党官员进行调查的报道，由于这是一个中国媒体报道题材的禁区，所以我这篇报道也被提及。有时候甚至新华社也会登一些有关人权的报道。这的确非常非常奇怪。

所以，是的，我同意，两面都是重要的受众。

**马林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就是那位。

**提问：**试音，试音。我想问，你们在中国采访公开活动的时候有多大的自由度——比如说在北京或你负责报道领域的公开活动，也可以是你负责领域之外的公开活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现在怎么看？

**陈女士：**那我就从电视记者的角度谈谈。我想，基本上，不管你到哪里，带着 12 箱设备，要想不引人注目地工作十分困难。在北京奥运会之前，正像我们刚才说过的，一切相当顺利。你偶尔会在地方官员那里遇到麻烦，但是只要你给他们看那条法律——我们不管到哪里都随身携带一份——说：“看，[这]允许我们出行以及和同意跟我们讲话的人交谈。”就没有问题。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我在中国的最后两年，情况变得，我们每次外出采访都准备好做猫捉老鼠的游戏，看我们何时会被抓。问题不是会不会被抓到，而是什么时候会被抓到。这与要采访的题目未必有必然联系。这是——就是主观的，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没有统计学的意义——我是说，我不很肯定——我不知道其他记者的经历，但这绝对是个问题，而且变得越来越糟。

我们——我们电视记者组的工作方式是，你如果飞到一个机场，在酒店入住，就必须给他们带签证的护照。他们复印以后直接传真到警察局。因此，他们知道你们到了那里。如果你想避开这些，我们用的一个策略是飞到离那里最近的一个机场，然后精疲力尽地——你知道，中国很大——精疲力尽地开车八九个小时，去做我们其实真正想做的报道，这样他们就不会知道我们为什么在那里。还有，我们干脆不订酒店，是的，肯定睡不好觉。

另外，我们电视采访组还会，比如，凌晨到达一个村庄，只待两个小时就离开。我们给自己留两小时的空档，因为过了这段时间，就会有黑色的汽车开来，给我们麻烦。我记得那次在新疆，我们到乌鲁木齐/喀什地区，一共去了 9 天。不管我们乘飞机到哪里，在哪里降落，都会有两辆汽车，我们到哪儿就跟到哪儿，让我们根本不可能和任何人交谈而又不让他们随后陷于险境。每辆车里有 4 个人，不管我们到哪里他们都轮流跟着。他们跟着走，拍摄我们，或监视我们。

后来情况越来越糟，在那种情况下难于工作。有一个好笑的故事。我们那个时候有兴趣多了解将成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是吧？所以我们就去了他的——他年轻时候曾经生活过的一个村庄。我们选择了 1 月 1 号，因为我们想着当地那些官员在前一天晚上都会喝些酒，不会那么快赶到村子里。我们是想以防万一，结果还真是如此。你为了得到你想要的信息，

就要把一切细节都算计地清清楚楚。但是一些当地人给官员打电话，说：“啊，这里有一个电视采访组。”他们赶到的时间比通常晚一些。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信息之后就离开了，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过来。

**麦克劳林女士：**我可以吗——你是不是——你在那个村庄里是不是没有被警察抓住？因为我就在那个村庄里被当地官员逮住了，不过他们开的是一辆计划生育车，我必须得说，挺吓人的。谁知道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笑声。）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抱歉，这个开了吗？好，太好了。这个问题是关于在中国之外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我想知道，除了在中国工作要面临的威胁以外，有没有中国之外的外国记者才会面临的威胁？我们听说过纽约时报网站和其它媒体受到的攻击。但是我想具体知道，你能不能谈谈记者们要面临的威胁？

**麦克劳林女士：**你是说在其它国家报道中国的记者吗？

**提问：**是的。

**麦克劳林女士：**好。那，我能告诉你，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报告的确说——发现试图影响在中国以外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的趋势有所上升，令人堪忧。压力来自这些记者的驻在国或本国的中国大使馆。泰国有一个例子，我想，与报道西藏有关。曾经有过几例这样的事情。我知道我2013年给[英国]“卫报”写的一些有关非洲假药的报道导致“卫报”驻北京记者站受到一些压力。那些报道不是在中国写的，而是在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写的。

因此，这种压力在全世界都有增加的趋势。我无法确切地说正在发生什么，因为没有直接发生在我身上，都是听说的，有一些向在中国之外报道中国施加影响的企图。

**温先生：**尤其是因为他们在进行这种威吓的很多时候采用了新手段——比如，网络。网络无边界。我在去中国之前做了两年或两年半的驻国务院记者。那段时间，我写了好多有关中国的报道。谷歌电邮有个功能，告诉你你可能受到有国家支持的入侵，或有人试图侵入你的电邮。我、还有华盛顿邮报的其他一些记者都收到过这类警告，尽管我们不在中国或不在北京。

**马林诺夫斯基助理国务卿：**索菲。或者——

**提问：**大家好。我的问题有关香港去年发生的示威，也有关台湾即将举行的选举。我们知道，社会活动受到中国新闻审查的严格控制，但是，香港的示威是否导致了中国媒体状况的改变，如果有，是什么改变？

**温先生：**能否请你具体说明一下？如何——

**提问：**这些示威，以及有关香港示威的报道如何改变了中国媒体，既包括新闻审查，也包括——例如，公众对这类活动的看法？

**温先生：**关于香港抗议，有意思的是，它就像是所有党的领袖的噩梦。他们立刻封闭了 Instagram，因为有大量的照片在上面疯传。我们——我们记者站——做了个非正式民调，给大约 30 个人打电话，问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对此持什么样的看法。结果真让人感到沮丧，我觉得他们对新闻报道的审查非常有效，只有官方媒体——对这样的敏感话题所有的官方媒体都只能转发中国官方新华社发的消息。我感觉这非常有效，人们认为，示威是在扰民，香港人判断有误，他们的要求太过分了。很难说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自己对天安门事件记忆阴影的影响，但是我感到，这是非常有效的新闻审查。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很不幸，这将是未来他们的——政府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一个模式。

**陈女士：**是的。我补充一下。我不认为香港发生的事情有——我是说，这对香港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从很多方面讲，1997 年的时候香港是个希望，希望它会将中国转向自由化，而我们所看到的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那里的记者受到威吓，独立办报人也受到很大的威吓。对于香港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坦率地讲，相当可怕。长期以来受到尊重、被视为不腐败或不会腐败的香港警察，现在人们对它有了前所未有过的看法，成为你的对立面。那是一个民权社会得以繁荣发展的唯一地方，我们见过它可以发挥多大的威力；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它的局限，也看到中国政府对此做出的反应。

不幸的是，你现在看到，过去只有在中国大陆才使用的手段现在在香港出现了，用来打击参加雨伞运动的人们，等等。我想这对那个城市来说是令人担忧的时期。

**提问：**大家好。我是索菲·理查森。我是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谢谢汤姆今天上午主办这个活动。首先，感谢你们三人过去几年里做的一些有关人权的出色报道。我想，你们的工作设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我要实行民主，让你们自选要回答的问题。（笑声。）第一个是想听你们谁来简单谈谈，你认为，如果真有的话，是什么改变了北京对待驻中国的外国记者的想法。凯瑟琳，我同意你的观点，在一个短暂时期内那些新规定得到遵守，然后就被极为有效地忽视了。你认为有没有什么做法能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时期的状况。

梅利莎，你有关自我新闻审查的讲述令人心碎。我想，由于你们不能写你们想做的报道，一些我们认为重要，应该知道的消息从未被报道过。所以你们当中有谁愿意谈一谈那些你们想报道但是却不能或没有报道的消息？我非常想听一听。谢谢。

**麦克劳林女士：**提到有什么做法能让情况好转，我完全不知道。我是说，我倾向认为，2008 年可能是暂时现象，因为感觉就是如此。我还认为，在现政权领导下，2015 年的中国完全无视国际压力。我觉得在 2006 年到 2008 年期间，有过一些开放，也对国际压力做了些让步。我是说，那些规定改变的原因是北京要举办奥运会，他们为举办奥运会而做出了给中国记者和外国媒体新闻自由的妥协。他们期待回报——数以百计的外国媒体前往北京。所以，他们必须这样做。

我——如果他们获得了冬季奥运会主办权，那种情况还会重现吗？我不知道。我确切知道——我在中国整个期间，从来没有看到中国那样地无视国际压力。我想，中国现在的力量强大到它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听从他人。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悲观的回答。不过 2008 年的确让人感觉就是暂时现象。

**陈女士：**是的。2008年奥运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我想非常值得与中国现在争取主办冬季奥运会的努力比较一下。北京正在争取主办2022年冬奥会，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和中国进行2008年曾进行过的那种对话。2008年之前，国际奥委会的一个观点是，这将成为中国崭露头角的机会，中国将自由化，将出现令人赞叹的局面，这是鼓励中国朝正确方向发展的大手笔。我们现在没有那样的对话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赢得了话语权，因为没有人——对北京提出质疑，没有人向北京施加压力，说：“好。必须要在新闻自由方面做一、二、三这几件事，才能胜过阿拉木图，获得主办权。”所以，我认为，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那是06、07年发生的对话，而这次申请主办权没有这种对话。

关于你提到的自我新闻审查的具体问题，我想到两个例子。那个时候，广东省一个村庄——乌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情况。而我们没有去。我们没去。那里的村民站了起来，要在这个小村庄争取实行民主，举行选举，要求改革。另一件事，是藏区的自焚事件。我们都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消息。是什么——人们的感受要强烈到什么程度才会让他们用自焚来表达？不仅是一两个人，而是很多人。我们真的觉得这是我们要报道的消息，但是出于多种原因——不仅仅因为我们所受到的压力，还有实际问题，如何找到愿意和我们说话的人而不要让他们因此陷于危险。但那肯定是考虑的因素之一。很不幸，这并不十分光彩。

此外，是的。我想，2008年那些有关媒体的规定，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基本上觉得那个时候中国一直咬紧牙关，好像说：“哦，先把这个挺过去。一到2009年，我们就做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把自由全收回来。”我记得，特别对我来说，在09年，2009年的夏天，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奥运盛会结束了，开放和新闻自由也结束了。我当时站在空荡荡的[录音不清楚]办公室里。一些律师、维权律师在用这个办公室，他们的办公室被洗劫一空，官员拿走了他们的文件。办公室里空空如也。我想，除了一把椅子，一张桌子，就没有什么其它家具了。我们去那里是要采访滕彪。他后来也被投入监狱。

关于自我新闻审查的问题，我忘了说一点，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一些年轻的美国记者刚开始在中国工作，或者想去中国，问我有什么建议。他们都考虑到了自我审查范畴内的问题，说：“好吧。我想在中国写很多报道，但是我会避免一、二、三，因为我看到在你身上和路透社的慕亦仁身上发生的事情，看到中国正在向纽约时报发起的报复战。”他们在改变自己的行为。我们现在说的是新一代美国记者，他们的职责就是让美国公众了解美国和中国之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美中关系。他们在改变他们的常态。我一点也不认为这是什么好现象。

**温先生：**我只想补充一下——是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坐在这里一直在努力思考，而这也是所有人都想搞明白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为推动新闻自由做什么？我想，我是说，从非常悲观的角度来说，我想我们最多只能做到不放弃新闻自由，不让它进一步受到侵蚀。如果我们能做到这点，我觉得，那真的就是一个大成就，虽然这样说令人悲哀。因为，就以纽约时报的签证为例——他们根本得不到新签证，不能向那里派记者。大约一年前，看来就好像连当时已经在中国的记者——纽约时报在中国仅存的记者——也可能都拿不到签证，在获得签证的问题上遇到麻烦。不过，他们有拜登……

(录音完)

###